

麦浪飘香话拾麦

本报老年记者 侯思亮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……”又到了麦穗飘香，麦浪翻滚的时节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望着诗意般潋滟起伏的麦浪，嗅着葳蕤股清新芬芳的麦香，少年时代的拾麦片断瞬间占据了我的心房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期，每到麦收时节，学校都要组织正上小学的我们到农村去，帮助生产队拾捡遗落在田间地头的零星麦子。

麦收时节，似火的太阳将大地炙烤得热浪翻滚。可尽管如此，听说要去帮助生产队拾麦子，我们还是非常兴奋，毕竟不用坐在教室里学习了，还能喝上甘甜的绿豆水。

为了防止身体被田里的麦茬扎伤，老师会提前要求我们穿上长袖衣服和长裤，换上布鞋，临出发前还会给每名同学发放一包仁丹、一盒清凉油。然后，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，步调一致地唱着《我是公社小社员》歌曲，精神抖擞地走出校园。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前飘扬，十分醒目。

到了田间地头，根据地块大小，大家等距离一字排

开，随着老师一声令下，便拉开了拾麦的序幕。在捡拾的过程中，我潜意识里感觉散落在地里的麦子像是一个个迷路的孩子，稚嫩的脸上写满了渴望。看到我们的到来，它们立即用求助的眼神望着我们并大声呼喊：“我在这里，快带我回家，我要回家。”于是，少先队员的责任感驱使我快步走上前去，将它们一个个捡起来，并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这些迷路的宝宝们回到温暖的家中，回到集体的怀抱中。因此，尽管太阳很毒，天气很热，我仍然按照老师的要求，一丝不苟地认真扫描着每一片土地，尽量不让一粒麦子掉队，不让一粒麦子哭泣。

一个小时左右，农民伯伯热情地送来两大桶放了糖的绿豆水供我们解渴，老师也会借此让大家休息一下。这个时候，一些调皮的男同学来了精神，他们分头在麦茬地里跑来跑去捕捉虫子。还有一些同学围坐在田埂边的树荫下，听农民伯伯讲一些风趣幽默的民间故事。一时间，此起彼伏的嬉闹声、欢笑声在热浪袭人的麦田里回荡着。
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

经过一下午的努力，太阳偏西的时候，我们的任务圆满完成。看着农民伯伯用架子车拉着我们的劳动成果向生产队走去，我们的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甘甜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之后，我们如同得胜的士兵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沐浴着夕阳的余晖，在《打靶归来》的歌声中愉快地返回校园。

印象中，拾麦活动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。那既是当时麦收时节庄稼地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也是我们开心、快乐的少年时光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梭。转眼间，累并快乐的拾麦活动已远离我们半个世纪。现在想来，那是我迄今为止比较接近的一次农村生活。正是通过这种生活，我逐渐明白了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深刻内涵，明白了农民伯伯起早贪黑、一个汗珠摔八瓣的辛苦，明白了我们碗里一粥一饭来之不易。随着时代的发展、技术的进步、科技水平的提高，我也深深意识到幸福生活不仅仅需要辛勤汗水的浇灌、寒耕热耘的付出，更需要技术力量的支撑和科技之花的绽放。



颗粒归仓
谷茂安 摄



艰辛中年赶考路

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

1975年5月，我从部队复员返乡后，被生产大队领导推荐到当地一所联办中学当民办教师。上任伊始，我满怀热情，决心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有所作为。可当我走上讲台，面对几十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时，渐渐感到自身知识的匮乏。幸运的是，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，给我带来了继续深造的难得机遇。从此，我走上了一条长达4年之久的艰辛高考求学路。

当民办教师，生活是清贫的；对高考的渴望，让我的精神富有。然而，已而立之年、初中尚未毕业的我，想要考入大学谈何容易？对理想的执着追求，让我横下一条心，开始恶补知识。我借来高中阶段的各科教材，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，课文一篇一篇地啃，习题一道一道地做，知识点一个一个地理解记忆……不论严冬盛夏，我半夜即起，一直学习到天亮，然后和学生一起上早操、早自习。临睡前，我躺在床上还要把贴在墙上的各科知识点逐个过关。初次参加高考，心里没有底气，也无勇气。同事和朋友们劝道：“考学考学，只有考不上学，哪有不考上学？”在大家的鼓励下，我走进考场。成绩揭晓，榜上无名。但我没有懊悔，因为我从考试中积累了经验教训，心理素质、应试能力有了提高，考学欲望反而更加强烈。

第二年，我继续努力拼搏，复习备考又有进步。考试前一天下午，我徒步前往30多公里外的县城考点赶考。行至一条深山沟时，老天突然变脸，电闪雷鸣，暴雨倾盆，我艰难前行。天黑了，我只好投宿在过路村的亲戚家中。次日2时，天仍淅淅沥沥地下着雨，路上水坑处处，路面泥泞湿滑，为了准时

应考，我不顾夜黑路险，约摸着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行走，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。进入考场时，语文科目已开考20多分钟，气喘吁吁、心神未定的我开始埋头答卷。作文刚写完最后一个字，考试结束铃声响起，来不及复查，我走出考场。那一年，我以1分之差再次落榜。

最艰辛的高考要数我的第三个高考季。那一年，心爱的二女儿在邻居家不慎摔倒磕到前额，头部神经受损，从此精神失常。之后，我带着她四处求医，不见好转，聪颖乖巧的她从此变成了精神残疾人。我的心在滴血。为了实现梦想，我忍痛边工作边为她治病边复习备考。为了凑药费，星期六下午放学，我手持镰刀，在回家沿路两旁的山坡上割荆条和麻节棍。周日晚上，父母和兄弟帮我修理扎捆。周一早晨，我用扁担挑到学校边上的供销社卖钱。高考预考前一天下午，我还在责任田里割麦子，到了傍晚，才匆匆徒步赶往县城准备次日的考试。预考顺利过关，高考仍未如愿。好心的父亲劝我放弃，说我已是一家之主，农忙时种地，农闲时搞副业，打粮赚钱，养家糊口。我承诺，再给我最后一年时间。

第四次高考，是我省高等院校面向民办教师招生的最后一次考试。好在我搭上了最后一班车，榜上有名时，我感慨道：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；辛勤耕耘，不一定会成功，但总会有收获；收获积累多了，梦想终究会变为现实。金秋九月，豆谷飘香。我怀揣那轻飘飘又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，带着几分激动与兴奋，乘火车赶往某师范高校。在我跨进列车车门的那一刻，列车开动了。那一年，我33岁。

说说白面馒头那些事

本报老年记者 朱帮义

我对白面馒头情有独钟。

过去，人们的物质生活十分贫困，平时一日三餐都是吃黑面馍和杂面馒头，每年只有刚收麦子或过年时才能吃上白面馒头。

父亲学会了蒸馍。他到集市上买了些麦子，和母亲一起推石磨磨出面粉，制作成白面馒头再到集市上卖。虽然卖白面馒头，可我们平时吃不起白面馒头。小麦加工成面粉，剩下的麦麸就是一家人的口粮，

麦麸可以做成糊糊当稀饭，或在麦麸里掺入一些高粱面加工成杂面馒头。就这，能吃饱就不错了。每天早晨，我跟着父亲到集市上卖馍，蒸歪的馒头卖相不好，父亲就会找最歪的白面馒头让我吃。那个时候，真是无比幸福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人们生活普遍困难。我在县城上初中，学校一天三顿饭吃的虽是白面，但供应的数量极少。妹妹7岁，弟弟2岁，个个饿得饥瘦如柴。周

六下午我回家，就把在学校省下来的白面馒头带回去让他们吃，星期一返校时再带些红薯和杂面馒头到学校吃。后来，我参军入伍，部队也是按量供应，一个星期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。

如今，我已步入耄耋之年，仍然保持着吃白面馒头的习惯。我从小跟父亲学会了做手工馍，所以，我们家平时很少买馒头，都是我自己动手蒸，一家人都夸我馒头蒸得好吃。

银发颂

本报老年记者 马元章

参加银发宣讲团，发挥余热作奉献。
退休不图志千里，愿为党建添块砖。

雨后观花

本报老年记者 周月云

昨夜风雨乍作狂，落英化尘亦留香。
细看嫩叶包新蕊，丝丝仙气入心房。